

水浒英雄的起点与终点 ——《水浒传》英雄性质论争新思考

冯汝常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 水浒英雄早期个体的反抗起点往往多因个人遭遇的社会不公而起,有所谓“为盗”与“匪气”的性质,但是由于实现了上梁山在宋江领导下对抗官府而“替天行道”这个英雄群体所追求的理想终点,使水浒英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研究《水浒传》须从整体上考察水浒英雄的性质。

[关键词] 水浒传; 英雄; 起点; 终点; 论争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6-0089-04

虽然有人曾说《水浒》“就是一部‘匪魂颂’”^[1],也有人说:“那么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里面有没有强盗呢,应该说是有的,……这个强盗还不只一个,而是一大批。”^[2]但是都不如近来吴越《品水浒》那样的彻底否定《水浒传》英雄的正义性,如他在《水龙吟·我评水浒》中写“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3]这并不稀奇,也并非如该书序言所说:“如此尖锐泼辣的品评,如此一针见血的论说,凸显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别出心裁的眼光和见识。可以说,《吴越品水浒》一书是对历代以来误读、误解、误导《水浒》的一次颠覆性的拨乱反正。”^[3]其实对于《水浒传》水浒英雄的“造反”行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评价。

在封建社会中,除了那些封建正统文人的“诲盗”说(田汝成)外,明代李贽与清代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论较有代表性。李贽首先提出了“发愤说”,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4]¹⁴⁸⁸金圣叹虽把梁山英雄也称作“强盗”,却提出了“乱自上作”说,“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5]这二说基本上指出了《水浒传》中英雄们的“造反”性质。近现代阶段,胡适《〈水浒传〉考证》曾说“这七十回的《水浒传》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中则指出“《水浒传》是中国英雄传奇中最古的著作。……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伙以宋江为领袖,占据着梁山泊的劫富济贫的英雄们的故事。”^[6]⁵³这两种观点代表了彼

时主要看法。“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水浒传》主题研究中,农民起义说占主导地位。”^[7]改革开放以来,《水浒传》的主题除农民起义说以外,还出现了“忠奸斗争说”、“市民说”、“游民说”等,这些多肯定了水浒英雄斗争的正义性质。但近年来吴越“以人性善恶评《水浒》”说:“《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和铁杆儿歹徒做主角,”^[3]宋江“分明是一个多重人格的黑社会头子”,“他所带领的那一帮兄弟”都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土匪!”^[3]²⁰⁸“李逵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3]²⁵⁹等等,颇显复古习气。

其实,要解决《水浒传》中水浒英雄究竟是农民起义英雄还是“强盗”的论争,我们需要从总体上考察,还原《水浒传》中英雄个体的起点,找出梁山英雄群体的终点,如此才能解决存在的疑惑与有关论争。

一 关于水浒英雄义举起点的界说

从文本接受上看,《水浒传》中英雄们在“起义”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个体行为原点的缺憾。如个体英雄代表林冲上梁山是因为报仇杀人而上山“落草”,具有一定规模的“七星聚义”而“智取生辰纲”也是为了“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甚至如吴用劝阮家三弟兄所说:“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一世快活。”^[8]²⁰⁴那么,该如何看待《水浒传》中英雄们个体行为“义举”的起点呢?

明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序中说:“余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8]¹⁶⁸。指出了《水浒传》中英雄们义举的起点是出于“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遂啸聚山林”而“有

[收稿日期] 2009-09-22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课题“水浒学史——水浒寻根八百年”资助(编号:2009B134)。

[作者简介] 冯汝常(1965-),男,河北大名,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副教授。

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这个分析评价是正面的,因为从统计数字看,“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者一百零八人中共有七十人。与此不同,清金圣叹从封建文人仇视造反者的传统立场评论说:“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剽削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8] 211}在《宋史纲批语》中,金圣叹又重复此一观点,说:“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继而称兵,皆有之也”^{[8] 215}。金氏指出了《水浒传》“盗贼”发生发展的成长过程,把“为盗”原因归于社会。其后,清代其他研究者也有类似评点,如王仕云说:“(百八人者)不幸生徽宗时,或迫饥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为盗耳。”^{[8] 306}赏心居士也有“故夫英雄之生,虽始而困顿抑郁”之说^{[8] 309},陈枚《水浒传传》则进一步说:“权奸筹国,顷致无术,遂使群雄各逞血性,显出一番闹热。”^{[8] 317}他们多以“英雄”称道水浒好汉。

近代以来,王韬《〈水浒传〉序》有:“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途穷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遂至失身于盗贼。”^{[8] 328}王钟麒则说:“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8] 340}等也揭示了《水浒传》中群雄“穷而为寇为盗”、“愤而为盗”的社会与个体因素。

明清时期及近代社会的研究者对《水浒传》中英雄“入草”或造反起点的分析多是有所依据的,即水浒英雄们在未进水浒之前的个体行为往往多是因个人遭遇社会不平而“为寇为盗”的。据文本统计,一百零八人中有“落草”经历的为三十二人。

现代以来的研究者,如胡适、鲁迅等人,对于《水浒传》水浒英雄起义的起点没有如明清时期研究者那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从有关论述中也可看出其倾向。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谈到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时,说:“(第一段)这段连写五个不肯做强盗的好汉,他的命意自然是要把英雄落草的罪名归到贪官污吏身上去。”^{[6] 36}这里用“不肯做强盗”与“不肯落草”从侧面表明了对水浒英雄早期个体反抗性质的观点。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在评价《水浒传》时说:“此书完全为贪官污吏与不良政治的反映,所以处处表现出一种强毅的反抗的精神。读者试看,所谓的一百零八个强盗,哪一个甘心自愿上梁山入伙的?每个都为到了‘不得不’的地步,才走向‘水浒’中去!”^[9]

当代以来,对《水浒传》英雄群体的评价一般都比较高。如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在论及“农民起义的过程”时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有的是领袖人物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揭竿而起,来势迅猛;有的则是经过长期酝酿,由小到大,以‘占山为王’的形式建立起根据地,逐步发展成声势浩大的队伍,进而攻城掠地,除暴安良。《水浒传》所描述的宋江起义,即属于后者。”^[10]《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论及水浒英雄时说:“《水浒传》描写一百零八位英雄的反抗经

历大致可划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草莽英雄属于主动型的反抗者。……被动型反抗者中如林冲、杨志、宋江、柴进等人的反抗道路曲折而富有典型意义。”^[11]用“反抗者”指认英雄个体行为显然比直接用“起义”一词更为符合实际。

前人对于《水浒传》中英雄反抗起点的有关评论及不同观点的存在,表明研究《水浒传》的立场不同,观点自异。不可否认,《水浒传》中英雄个体在上梁山之前的反抗,或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或斗殴杀人亡命逃匿,或上山落草劫掠对抗官府,或因故遭陷害而快意杀仇等,几乎多是个体对具体压迫者的反抗或英雄行为,此可视为梁山英雄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也不能否认“为盗”甚至存在“匪气”的事实,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起点具有的反抗性质才使梁山聚义的群体起义成为可能。没有这个起点,梁山泊英雄的群体反抗就不可能发生。

二 关于水浒英雄起义终点的阐释

研究者在探讨《水浒传》英雄好汉形象时,往往着眼于个体英雄的成长史,而上梁山见宋公明加入起义大军“替天行道”也成了众多好汉仰慕的理想。那么,上梁山就有理由充当这个终点。这个终点不是英雄个体与群体自身生命的终点,也不是梁山英雄招安与征讨田虎、王庆、征辽直至“魂聚寥儿洼”等故事结局性终点,而是能够体现英雄个体理想的终点,即——上梁山聚义,替天行道。这不仅体现在英雄个体向往梁山时所言“仗义疏财”与“替天行道”,而且在“九天玄女”的天书与“天降石碣”时再次体现。如《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就写:“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4] 617}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英雄排座次”也有(何道士)说道:“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面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4] 1041}“替天行道”成为水浒英雄的口号,代表了英雄们的理想追求。

明代张凤翼《水浒传序》联系宋“至徽宗,无足观矣。当时,南衙北司,非京即贾,非球(俅)即勳……”之朝纲不振事实,说:“宋江辈逋逃于城旦,渊薮于山泽,指而鸣之曰:是鼎食而当鼎烹者也,是丹毂而当赤其族者也!建旗鼓而攻之。”^{[8] 176}对于梁山英雄反抗昏庸的宋政权的壮举也给予了肯定。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上了梁山以宋江为代表的英雄们心存“忠义”,说:“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8] 172}这个评价不仅把水泊梁山英雄起义的性质上升到封建道德最高层次的“忠义”,而且也揭示出了梁山英雄们内心的真正理想在于“专图报国”,那“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之语,简直是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心忧其君”士大夫忧国的翻版。

清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里对水浒英雄大多给予了具有赞叹性的评价。如说“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论武松则是“直是天神”,谈到李逵时竟然引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评价,等等。

近代以来的文人大多以新的政治民主与社会革命思想来看待《水浒传》,认为梁山英雄好汉们在水泊梁山建立起了一个民主平等的政权。如燕南尚生就说:“《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8] 347}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曰‘替天行道’。”^{[8] 357}定一《小说丛话》有:“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8] 366}用新时期的理论阐释《水浒传》思想,把今人的理想视为古人的追求,这是本时期《水浒传》阐释的流行观点。当然,也有人以为不然,如吴沃尧《说小说》言:“如《水浒传》志盗之书也,而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不过彼叙此一百八人聚义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会之现状耳。”^{[8] 371}

到了现代,胡适在《〈水浒传〉考证》评论说:“宋元人借这个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6] 41-42}而鲁迅则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2]无论出发点有多大差异,二位研究者都指出了《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替天行道”的追求,即梁山英雄们上梁山所做的事业绝对不是为了个体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天下、国家。

进入新中国后,研究者多是把《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与中国社会革命性质的起义联系在一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解读《水浒传》,侧重从主题思想上挖掘其现实意义,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把宋江等水泊梁山好汉看做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英雄。但是,开始于 1975 年“文革”后期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把文学研究政治化。新时期拨乱反正后,《水浒传》研究才又回归到文学性,《水浒传》主题研究出现了“市民说”、“忠奸斗争说”、“反映游民意识说”、“人民起义说”等新论,大多都倾向于肯定梁山英雄群体对北宋社会腐败统治的反抗行为。

应当承认,从英雄个体反抗到上梁山成为百单八英雄群体与北宋政权形成对抗,梁山泊英雄们在“替天行道”这个终点真正实现了聚义向往的理想,使个体反抗阶段“为盗”性质转换为具有正义性质的梁山群体英雄起义。

三 文本阐释中的起点至终点的转变

《水浒传》中英雄个体反抗的起点虽然多是快意恩仇或带有不得已性质的“逼上梁山”,但是这个带有“为盗”与“匪气”起点的低层次却不能够否决梁山泊英雄聚义“替天行道”群体理想的高尚,当然从英雄个体起点时的低级诉求到英雄群体终点的高级理想之间必定包含一个个体到群体的转变过程。把英雄个体贯穿在一起并实现从个体反抗到群

体起义,这个转变的领导者或引导者是梁山首领宋江。这可以从《水浒传》文本形成过程及有关《水浒传》的研究评论中得到印证。

《宋史》卷 22《徽宗记》宣和三年二月载有:“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南宋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序有:“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8] 19-20}由此可见,宋江从水浒故事的源头就占据了首要位置,他是水浒故事的标签性符号。其后,元代戏曲中的宋江继续做梁山领导人,到了《水浒传》中宋江就真正成了水浒英雄从个体性质的反抗转向水泊梁山集体起义的领导——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与宋政权形成实质对抗。因此,后来的批评家们多把评论的焦点集中在宋江身上。如明代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就说:“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梟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者,必非庸众人也。”^{[8] 168}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也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8] 172}揭示了宋江“忠义之烈”的个性与能够领导梁山群雄的根本原因。明代吴从先评宋江:“夫江,一亭长耳,性善饮,朋从与游,江能尽醉之,且悉其欢。人驯谨,而其中了然呐厚,而其诺石坚然,抚孤济茆,人人得呼公明,人人咸愿为公明用也。”^{[8] 193}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宋江由于能够扶危济困性的“抚孤济茆”而使江湖豪杰愿意为他效命。明代的评论者对于《水浒传》中的宋江大多持肯定态度,指出了他能够领导梁山英雄的具体原因。

金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6] 42}他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与自我特色的批点,评论宋江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馀便饶恕了。”金圣叹并没有完全吃透《水浒传》的思想性质,非常痛恶“盗魁”宋江,却从反面证明了宋江《水浒传》中的领导地位。明清两代对《水浒传》中宋江的评论使我们看出了宋江在水浒英雄中的核心地位与政治英明,无论是“忠义之烈”还是“盗魁”等论说,都证明了宋江是山寨之主,他使梁山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领导梁山英雄对抗官府“替天行道”,不再是打家劫舍的“草寇”,即实现了英雄个体时期或快意恩仇或落草为盗等到梁山群体杀富济贫扫恶除奸等起义性质“替天行道”的身份转换。

当然,对于《水浒传》梁山英雄起义起点与终点的追溯并非重复前人的论述,意在将《水浒传》研究回归文本本身。那么,在《水浒传》个体英雄上梁山的过程中,宋江发挥了什么作用?

通过文本统计, 水浒英雄加入梁山过程中与宋江有直接关系的占 70% 还要多, 而这些英雄们上山的主要目的, 根据类别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追求“大碗喝酒, 大快吃肉, 论秤分金银, 论套穿衣服”等基本物质追求, 当然也有仰慕或借助宋江“仗义疏财, 济困扶危”之名; 二是因为救朋友或亲人而造反上山者; 三是兵败投降者, 在宋江“替天行道”殷勤表白告求与“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 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等劝说下归顺梁山, 暂居水泊; 四是被请上梁山, 共聚大义者, 他们多“等待招安, 为国出力”。第一类多是出身绿林者, 第二、三类多是出身官府, 第四类多是有才能者。而第一、二类人数最多, 略有 75 人, 他们也是梁山英雄群体中最具有起义性质的核心力量。

这些英雄们能够上山聚义, 主要联结人物是宋江, 他把英雄们从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与个人恩怨等逐渐引导到“共聚大义, 替天行道”, 完成或实现了个体英雄从起点到终点的根本转变。

因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梁山英雄起义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转变, 即从英雄个体反抗为起点, 或杀人亡命, 或落草抢劫, 或救人造反等, 最终统一汇聚于宋江领导下的水泊梁山“替天行道”, 形成与官府群体对抗的实质性起义。

在研究《水浒传》英雄行动的性质时, 我们不能以水浒英雄早期的个体行为“为盗”或“落草”的反抗来否定梁山泊群体“替天行道”的起义, 更不能简单地把水浒英雄的个体反抗等同于那些杀人越货的“土匪”、“魔头”。因此, 研究《水浒传》一定要把水浒英雄当作一个整体看, 把《水浒传》当作一整部书来看, 不应局限个别章回做盲人摸象那样的论

断, 否则就有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参考文献]

- [1] 陈勇, 孙勇进. 漫说水浒[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22
- [2] 大嘴呱呱. 大嘴话水浒[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 13
- [3] 吴越. 品水浒[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 [4] 施耐庵, 罗贯中. 水浒传(容与堂本)[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8
- [5] 宋杰. 水浒传(名家汇评本)[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7
- [6] 竺青选. 名家解读水浒传[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7] 齐裕焜, 王子宽.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325
- [8] 朱一玄, 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 [9] 郭箴一. 中国小说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9: 284
- [10] 郭预衡. 中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09
- [11] 陈颖. 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43
- [12]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161

The Hero's Beginning and Destination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 new ponder on "Outlaws of the Marsh" of heroic nature debate

FENG Ru- cha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heroes in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resided mainly because of their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injustice in society with the nature of so-called "stealish" and "Bandit", but after achieving ideal of "Enforcing justice on behalf of Heaven" in Liangshan to confront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ong Jiang, the heroes had a fundamental change. The book should be studied from the whole heroes.

Key words Outlaws of the Marsh; heroes; beginning; destination; controversy